

论全球化过程中的责任大国

魏青松^{1 2}

(1. 同济大学 法政学院, 上海 200092 ;

2.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 在全球化进程中, 责任大国的经济和政治对地区或全球的影响都比较大, 它参与或主导制定区域性或全球性规则, 而且, 其独立性倾向和依赖性倾向同样明显。中国可以从提升政府竞争力、平衡和引导国内力量、恰当处理利益存量和增量的关系、协调与地区性或跨国性组织的行动等方面着手, 进行战略分析和选择。

关键词 责任大国 特征 利益考量 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09)04—0058—05

全球化是 21 世纪初最为显著的具有全球影响的现象之一。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 全球化是在经济一体化基础上,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 它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许多区域性或全球性责任大国随之就出现了。本文就全球化过程中责任大国的特征、利益倾向和战略选择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全球化与责任大国

1. 全球化: 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过程

事实上, 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 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既包含一体化的趋势, 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 既有单一化, 又有多样化; 既是集中化, 又是分散化; 既是国际化, 又是本土化^{[1](P3)}。至今为止, 全球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影响, 这种影响无论

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几乎超过了所有其他现象或事物对全球领域的影响, 尤其是对民族国家的影响更为深刻和持久, 各个国家很多最基本的、能够决定政治利益和政治结果及其性质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的力量和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范围。一个国家的一些内外事务和所面临问题的界限正日趋模糊, 在诸如毒品交易、艾滋病、环境、金融风暴等许多重大事情问题上, 一般都无法直接确定其归属, 更需要多个国家相互合作和协调行动, 仅仅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不能完全消除或解决这些问题。2008 年美国爆发的金融风暴波及全球并需要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应对才能够解决就是很好的明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继续加速发展, 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也会越来越多, 并日益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2. 责任大国: 一个客观的现实需求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大国必然会在

收稿日期 2008—12—03

作者简介 魏青松(1977~), 男, 同济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这一进程中承担应有的角色并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一个大国所肩负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它应当更好地履行应当承担的职能上,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更不能“错位”。也就是说,责任大国在地区性或跨区性的职能必须到位,职能的行使应当恰到好处,不能越权行使本应属于地区性或跨国性组织的权力,也不能行使本应属于社会的权力,更不能行使别的国家的职能。惟有做到上述几点,大国才能够更好地肩负起其所负的责任。从国内或全球利益的维护和增加的角度来看,地区性或全球性大国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一方面是基于责任大国自身利益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全球化不可逆转趋势所带来的巨大的外部压力。

二、全球化进程中责任大国的若干特征

1. 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较大

如上文所述,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个责任大国惟有做到既不“缺位”、又不“越位”、更不“错位”的条件下,才能够肩负起其责任,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发挥其功能。责任大国之所以能够在地区或全球产生影响或承担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责任,其主要原因在于责任大国的经济和政治能够对地区或全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主导性或决定性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短暂或持久,如同历史上法西斯统治时期及其对亚洲、欧洲或全球的影响。从大国的地位和责任来讲,大国的经济发展在某一时期都是比较快速的或者比较领先于其他别的国家的,而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会反映到大国所执行的政治战略和方针上,从而实现责任大国的经济和政治对地区或全球的直接或间接的深刻影响。

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交往更为密切,而全球化的机遇恰恰为责任大国提供了展现自身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舞台。从责任大国经济的带动作用来看,一般说来它的经济代表着该历史时期经济的较高或最高的水平和规模,并对责任大国周边或全球产生深远影响,其经济的变化成为该时期其他国家经济变化的晴雨表。从责任大国政治的牵制作用来看,一般说来它的政治决定着该历史时期政治格局的局部或全面的形成和发展,并对其周边或全球产生主导作用,其政治的变化成为该时期地区或全球政治格局变化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如历史上曾有过的某一个或几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带来地区或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调整和组合一样,并因此形成了能够

稳定一定时期的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全球化进程中,责任大国的经济和政治对地区或全球的影响比较大,否则,责任大国就失去了成为责任大国最为基本的条件和基础。这是一定历史时期责任大国的首要特征。

2. 参与或主导制定地区或国际规则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定时期的地区或国际规则的形成和发展是受到该时期某一责任大国或几个责任大国的明显或潜在的影响和制约的。通常而言,责任大国会参与或主导地区或国际规则的制定,其目的不仅仅在于维护与本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现有的有利于自身的地区或国际利益分配机制和制度,而且还在于发展与本国相关的、未来的有利于自身的地区或国际利益和权力分配机制和制度,以确保自身国家的利益不受到现有的或未来的地区或全球机制和制度因变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参与或主导制定地区或国际规则是责任大国展现自身实力、履行职能、承担责任的主要标志和特征。

从一般意义上讲,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大国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责任,而责任大国也期望并真正参与或主导制定地区或国际规则,以维护全球化正常有序的历史进程,实现本国发展战略目标和规划。只不过,尽管责任大国的出现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实需求,但某一个或某几个责任大国所承担的这种责任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还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责任大国自身的战略目标和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来进行综合分析。

3. 独立性倾向与依赖性倾向同样明显

事实上,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责任大国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自身角色和无法取代的独立地位,尤其是后者更是责任大国突出其显著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可能是责任大国一直会强调自身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即使是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国家仍然在运用其自身的权力推行将经济力量纳入到对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有利的轨道中去的政策。国家的经济利益既包括从国际经济活动中收获一份公平的甚至是略多的份额,也包括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性,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类区域性安排的潮流,只不过是国家为了达到收获目标而扩大了集体性的努力。就连自认为能够肩负起全球责任的美国也同样受其内在的尽最大努力追求国家利益的动力所驱动。美国在20世纪最后几年表现出的倾向是,无论在经济还是安全领域,美国都公然突出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反映的是国

内、有时具有偶然性的力量对比,与任何国际集体利益无关^{[2](P215)}。为了确保美国相对于其甚至最亲密和最强大盟国的霸权地位,美国一直摇摆于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对于美国来说,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加强与其他强国的合作,必须孤立、分化,或者吸纳潜在的竞争对手”^{[3](P380)}。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中的责任国家在经济贸易上的交往更加频繁,在政治上更加强调协商和合作,在文化上更加提倡兼容并包,全球化确实在加强责任大国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增加彼此之间的依赖性。一个明显的根本的事实就是,至少依靠各自的力量无法对抗作为全球化标志的行动地域的扩展,除非采取可能令自身陷入贫困的强制措施^{[2](P180)}。因为“几乎在政策的所有主要方面,处于区域和全球流动过程之中的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已经卷入了密集的跨国协调和规制之中”^{[4](P324)}。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一个国家发生的任何严重危机都可能波及其他国家,甚至是地理距离遥远的国家,有时仅仅是因为心理传染的效用。波涛可能逐步壮大,直至影响整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今要求新兴国家重组本国金融体系,在金融行业加强谨慎规则,增加透明度^{[2](P20)}。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波及全球金融行业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即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有多深,“一个国家纯粹基于私利的战略(这同样适用于美国)必定无法解决问题”^{[2](P199)}。

美国爆发的金融风暴并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实力所能够彻底解决的,它所需要的是全球责任大国的共同努力和应对。而且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和迅猛发展以及信息和电信的结合,彻底消灭了距离的概念,为所有责任大国采取一致行动和协调政策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

三、责任大国的利益考量

1. 不同利益间的张力:责任大国存在的困惑

如上文所述,责任大国的经济和政治对地区或全球的影响都比较大,参与或主导制定规则,且独立性和依赖性倾向同样明显,这就必然使责任大国在一定时期内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征比较明显,而在其他时期维护地区或国际利益的特征比较明显。在全球化过程中,责任大国一直受上述不同利益产生的张力所困惑,并因此产生国家行为和战略上的差异。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全球性或地区性的责任大国——既要不断地依靠自身的

独立地位来保存本国业已形成的现有的国家利益存量,又要不断地依靠与别的国家的相互依赖性来发展本国未来的有可能实现的国家利益增量,从而采取某种具有整体性意义的行为取向和战略选择。

尽管责任大国之间的联合行动和治理体系在解决许多问题时是十分有用的,但却受到了民族国家及其国内公民在政治上的对抗和利益上的冲突的严重限制,“任何解决治理问题的努力,都必须认识到这仍然是一个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起主导的世界”^{[3](P253)}。在对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不得不停进行选择时,责任大国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依然是深受二者之间的张力所影响,并为此困惑。即便是当今所谓的“超级帝国主义”的美国,在纯粹依靠自身全部能力来解决严重的金融风暴问题以维护本国利益并感到力不从心之际,它能做的、也仅仅所能做的就是密切与世界上其他责任大国的联系和协商,强调并强化彼此之间的依赖性,否则就会使本国的现有利益受到实质性的长期损害,使未来有可能增加的利益消失在特定时期过分追求自身利益倾向的思维和行为所形成的时空中。这就不难理解美国以下的做法了:当成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对国际体系整体的良好运行负有重大责任时,美国国会居然能够阻挠类似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成员的份额这样的决定的通过,而且是出于完全与涉及问题不相关的国内政治考量^{[2](P262)}。

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存量得以保存和利益总量不断增加的过程,倘若此点具有某种道理的话,那么就可以对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致力于分享一定历史时期全球利益存量的行为找到令人信服的、具有客观性的解释了,也能解释责任大国参与全球化的充分理由:它的主要任务绝不仅仅只是维护本国现有的利益水平,更主要的则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加速发展从而通过增加全球整体性的利益总量进而实现本国利益的相应增加。

2. 责任大国意识与行为倾向

尽管许多国家的权力仍然牢牢掌控在民族国家手中,并具有比较高的集中性,但是这种权力的实质,即国家进行统治的实际能力,正在悄悄改变其形式,经常体现和包含在不断变化的新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权威形式中。它可能造成一种分权的压力,因为全国性政府逐渐丧失原来对政策的控制权,国家的经济在国内的整合程度减弱,从而分散地纳入更大的世界^[5]。

这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向两个方向转移:“向上

转移”到跨国性的组织,“向下转移”到社会基层。全球化过程所引起的权力上下转移的事实给地区性或全球性责任大国造成一定影响,那就是它们不得不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和行为选择。

马克思在谈到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区别时认为,在历史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6](P282-283)}。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同样适合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每个国家依据自身的偏好和倾向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显然并没有意识到其行为对国际关系和国家社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种客观的不以国家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合力的结果就形成了有史以来关于国家关系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那就是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是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不以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纯粹的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尽管国家利益是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国际社会是由许多国家所构成,在国际社会中,起主要或者说主导作用的应当是地区性或全球性责任大国,其行为应当由目的、价值、情绪、传统^①4种因素所决定。责任大国只有意识到自身民族的感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并遵循人类共同的目的和价值,才能够承担起应当承担的责任,并在国际社会发挥主要或主导的作用。

只有意识到自身的角色和历史地位,并根据责任所赋予的精神实质来行使自身权力,责任大国才能够做到责权一致,恰当处理好国家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维护或增加国内外利益,实现预定的目标。

四、战略选择

全球化的过程是责任大国进行战略分析和战略选择的过程,责任大国必须适时、准确、全面地分析国内外环境形势,恰当地制定本国战略规划,调整国内外政策,才能发挥主导作用,维护和发展自身和国际利益。

1. 提升政府竞争力

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往往取决于政府的整体竞争力水平。提升我国政府竞争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意识形态竞争力。由于“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7](P53)},我国必须把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同理想和远大目标,灌输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头脑中去,促进和谐关系的建立,整合社会精神及文化资源,维护和扩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取向和国家必须进行战略分析和展望的全球化过程中,提高意识形态的竞争力更具有现实意义。二是发挥制度合力。政府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必须构建一个健康而透明的、灵活而又有凝聚力的政府体制,发挥制度的合力,因为“有效的协调合作和应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健康而透明的政府关系体系。这种体系应该促使各级政府就面临的问题和选择进行充分持续和公开的交流,应该既促使各级政府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又鼓励必要的合作;应该与各级政府为之服务的社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8]。三是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公务员队伍。政府竞争力的高低不仅仅取决于政府体制的顺畅和有效,而且还取决于是否有一支强有力的公务员队伍。为此,必须强化公务员的大局意识,拓展技能培训的内容和途径,加强公务员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服务水平和态度,以应对各种挑战。

2. 平衡和引导国内力量

事实上,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内利益矛盾和冲突不断扩大化而其解决办法又不断国际化的过程。在此种情况下,如何平衡和引导国内力量,协调利益关系,就成为影响政府进行战略分析和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的分离潜力(potentiel de dissociation)随着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2](P209)},加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统一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脆弱性,作为地域广阔、统一祖国的任务仍然艰巨的中国更需要警惕分离潜力的消极影

①韦伯认为,如同任何行为一样,社会行为由下列情况来决定:1. 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2. 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解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3. 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4. 传统的,由约定俗成的习惯。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版,第56页。

响,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因此,必须处理好国内民族之间的关系,平衡和引导国内各种力量,把它们纳入到正规的、体制内的、符合国家和社会愿望的轨道上来,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实现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

3. 恰当处理利益存量和增量的关系

从一定历史时期来看,一个国家利益的总量是不会发生变化的或者说会发生比较少的变化,利益的增量也基本上是如此,除非有科学技术的新突破和新发现。在责任大国的角色被凸现和地位被确立后,责任大国的责任就比较鲜明地突出出来了,也就是说在正常或特殊的情况下,责任大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做出比较大的贡献。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中对其他需要帮助的国家 and 地区伸出援助之手,就从侧面证明:责任大国不仅仅在经济利益上对需要帮助的国家或地区提供帮助,而且在道义和心理上都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这样才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不过,责任大国的付出和努力同时也意味着国内现有的利益存量的减少,但对于一个有远见的责任大国而言,这也许有可能意味着未来的利益存量有更大的增加,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责任大国的得失并不全都是以当下的利益得失来衡量的。这就是过去和目前中国对世界伸出援助之手的主要原因所在。可以预期的是,未来的中国在地区或国际事务中仍然会发挥积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会扮演责任大国的角色并因此承担相应责任。

4. 协调地区性或跨国性组织的行动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责任大国必须相互合作,协调行动。对于一个责任大国而言,采取合作和协同行动不仅仅纯粹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国际治理下国际利益的考量。事实上,“在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外交达成的各种安排,无论是否给予互惠原则,无论是简单且非正式的安排还是得到相关机构认可的安排,都符合治理的理念。围绕一个特殊行动领域的安排旨在将直接相关的主要行动者,包括政府或非政府的代表,聚合在一起”^[2](P181)]。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地区性的责任大国,中国更需要协调与其

他地区性或跨国性的责任大国或组织机构的行动,一致应对地区性或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毒品交易等诸多挑战,以求得自身发展的良好环境。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行动单元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特别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完全控制他者对自身以及自身对他者施加的影响。即使20世纪最极权的国家也没有做到这一点”^[2](P207)]。在此种条件下,协调行动与合作姿态更能使中国更快地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从而为维护或增加自身和国际利益创造良好的环境。

五、余 论

从目前来看,几个责任大国或者说几个责任区域构成了事实上的国际体系,我们可以预计到,国际体系仍将保持原来的混合特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责任大国也有自身利益诉求,并与国际共同利益产生一定程度的张力。在全球化趋势的深刻影响下,责任大国也需要进行战略分析和选择,同时采取符合自身行为逻辑的利益倾向和战略选择,并对地区或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 [1]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A].当代西方学术前沿研究报告[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2][法]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行动与世界体系[M].庄晨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3][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编.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4]David Held & Anthony McGrew.Governing Globalization [M]. Polity Press, 2002.
- [5]理查德·西米恩.联邦体制的适应能力与变革[J].刘北成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2(1).
- [6][德]马克思,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7][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责任编辑 范祖锜]